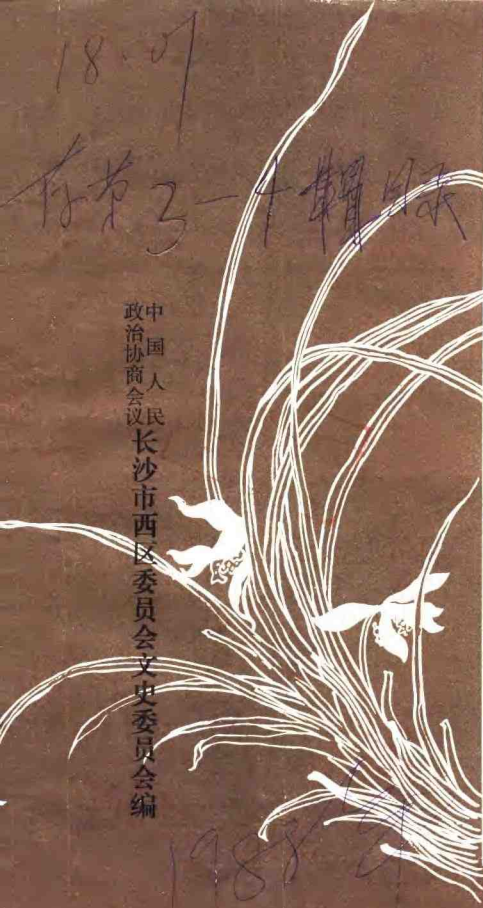


岳沙市西區文史資料

第5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長沙市西區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



18.07

存第3-4輯目錄

1988年

目 录

星沙人物：

回忆田汉同志在长沙 1

—— 张文祥

怀念廖夔老师 8

—— 李子科

民族资本家朱禹田 14

—— 朱运鸿

工商史话：

始建于西区的长沙五金业 18

—— 张仲昆

徐长兴烤鸭店 23

—— 王慧民

崛起在西区的长沙钱行业 29

—— 朱运鸿

武林趣闻：

我所知道的湖南国术训练所 33

—— 肖英杰

西区春秋:

西区码头简介 37

—— 傅贵章

娘娘庙的变迁 40

—— 兰 烟

回忆田汉同志在长沙

文史委员 张文枏

我国杰出的革命戏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作者田汉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我们一直没有忘记他。

田汉同志是我们湖南长沙人，他从小就酷爱戏剧，特别是对长沙的湘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10月，他随同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厅从武汉转移到长沙，由他亲自领导先后组成了七个湘剧抗敌宣传队，1939年元月又在长沙市北区三公祠原公医院旧址，以军委会政治部长沙工作队的名义，由田汉同志主持“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正式开学。除一个平宣队的演员外，主要都是湘剧队的演员，共有二百多人参加学习。演员训练班一切行动军事化，定有作息时间。晨起站队集合，早操、跑步后，田汉同志亲自讲课，主要阐述抗日救亡的意义及戏剧与抗战的关系等问题。其他时间是学文化，学唱歌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或者排练节目。这对长期在旧戏班生活惯了的人们来说，确定是件新鲜事。

演员训练班开学后，还特意地约请当时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老（特立）来讲课，徐老时年已过花甲，精神旺盛，穿着粗棉布中山服，足履布鞋，来到演员训练班，他操着长沙东乡的口音，向

大家作报告，首先阐述抗战形势，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万众一心，团结抗日，才能救亡图存。否则就有亡国，做亡国奴的危险……这些话使训练班的学员受到很大的启发。

在长沙举办的“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为期三个月，于四月四日在中山西路原银官戏院举行结业仪式，田老在会上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勤研艺事，把剧场当战场，把舞台当炮台……。特别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田老亲自发给的毕业证书上的一段话：

“湘剧演员×××在本班受训期满，成绩优良，对于抗战工作亦极努力，考核成绩及格，相应发给毕业证书执付为凭，在此国家艰危之际，并仰各励忠节，勤研艺事，务使戏剧艺术成为抗战宣传之利器，每一剧人成为坚强英勇之民族战士，有厚望焉”。

以上这些激励的词句，成为当时各剧队每个艺人的行动指针。与此同时，田老还亲自题词为各剧队制发舞台上使用的桌围、门帘及台口的横幅。桌围上写的是“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左右门帘上写的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台口的横幅写的是“大放光明”。

田老在当时先后所编写和改编的剧本如《江汉渔歌》《土桥之战》《梁红玉》《东北一角》《旅伴》《新会缘桥》《武松》等先后在各剧队上演了。由于这些剧目，富有抗战宣传意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情绪，起到了抗战宣传作用。

一九四〇年春天，我正在湘剧抗敌宣传第三队担任文书工作，

这时田老奉命离开长沙去重庆，临行前和我们摄影留别。同时还写给湘剧各队一封信，我现在还能记得其内容。开头两句话是“刻春水大涨，敌阉与汉奸有随时向我进攻之可能”。信中还写道：“社会风气渐流奢靡，殊非此严重时期所宜有”。“戏剧负有移风易俗之责任，况吾平、湘各剧队（“平”即京剧）以抗敌宣传为号召，若有失德，更不可恕”。信中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本身就有责任去转移社会风气，如果自己道德败坏的话，那就更不可容恕。最后提议要各剧队“应常开小组会作自我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为堕落之始”……田老写给湘剧队的这封信，距今将近四十八年了，我基本上能记住要点，这是对戏剧艺人的谆谆教诲，当时我曾抄写贴在演员宿舍门口，大家都是如饥似渴地读着，表示要共同遵守。

抗战胜利后1948年夏，田汉同志转入华北解放区之前，偕同夫人安娥回到家乡长沙，探望他的高龄老母及三弟田洪夫妇。

长沙湘剧界和灯影（皮影）、清唱艺人、湘剧爱好者及新闻界人士共四百多人，于六月十日（即农历五月初四日）在西区高井街湘春园戏院，举行欢迎大会。

当时，我是戏剧同业公会湘剧部的文书干事，负责筹备此事。那天当欢迎的横幅，标语刚贴上戏院门口时，田汉同志夫妇在田洪、陈绮霞同志的陪同下步行来了。他穿若天兰色旧衬衫，系青色领带，当时他年正五十岁，头发虽已斑白，但身体非常健康，精神旺盛。

当他见到迎候在门口的许多湘剧艺人时，热烈地握若他们的手，

劫后重逢，倍感亲切，当时的激动、感慨之情，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在一间住室里，湘剧界的名老艺人黄元和、王申和、徐绍清、罗元德、贺华元、廖申翥、王华运、余福星等，围绕在田老身旁，叙述在八年抗战中，湘剧艺术遭受严重摧残，艺人流离颠沛的情景。田汉同志询问及湘剧界旧交如欧元霞、吴绍芝、罗裕庭、胡普临、董海奎均死于国难，这时他一阵痛楚，淌下泪来，在座者亦相对唏嘘……

这时大家感到田老这次回来，只有短期逗留，以后天南地北，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便想请田老题诗留念，他欣然接受了、为了不打扰他的构思，除留下我准备纸笔墨砚外，其他人都告退出去了。

田老在桌上拿了一张便条纸，来回踱着，轻声吟哦，站在窗边在便条纸上记了几行字。不到三分钟时间，他便叫我倒杯热水，泡发硬结了的毛笔，然后对我说：“准备写呀！”说着他用秀丽的行草体，手如飞电，一挥而就：

第一首：

“梨园同有寸心丹，
百战罗吴数二难。
歌舞何须叹消歇，
精忠今已照人间。

题款上写着：“与元和、申和先生谈裕庭及欧、董诸君事，感为写此”。

第二首：

裂石 穿云若有神
桂江今想翠眉颦
歌场无限辛酸泪
不洒千锤百炼人

题款是：元和先生亦千锤百炼人，当有同感也。

第三首：

潏江重听董莲枝
艺事精时鬓已丝
一曲梨花两行泪
灵均辞赋少陵诗

题款是：戊子端午前一日为文祥同志写句。

并在每首诗下面左侧都签上一个“汉”字。以上三首诗，第一首是新作，第二、三首是录旧句。

田老题诗以后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发表讲话。

田老首先讲了湘剧在抗战时期的工作情况，指出不少湘剧艺人编写了抗战新剧，有的把旧的形式加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抗日宣传作用。接着说：在战争年代里，转徙流离，很多湘剧艺人死于国难，他们不为敌人歌舞，有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的忠臣。田汉同

志讲到这里时的语调非常激昂，台下的湘剧艺人听了为之感动不已。

田老讲话第二个要点是要培养下一代演员。他说：由于战争的原因，近十多年来湘剧没有正式科班。老艺人健在的寥寥无几，若不及早培养新一代，湘剧诚有失传之可能。

田老讲完话后，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他走到放签到名单的桌边，发现签名单上都是签的来宾和社会人士，他自己在左边签上名以后，对我说：“你拿去要到会的艺人都在这里签上名”。从这一点小事，可以看出田老对艺人的地位与人格的尊重。

会后演出田老过去创作的《武松》由湘剧名演员余福星、陈绮霞主演。

戏演完后，田汉同志特意地留住一些来宾和社会人士对剧本和演出进行座谈。

次日是农历端午节，上午黄元和先生约我同去看望田老，汇报湘剧目前的困境，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同时带去田老写的三首诗去加盖图章。都正街清香留巷内一所低矮木棚屋，就是田老的家。我们进门时正值田老陪着他的高龄老母亲及弟妹、侄儿在过节，可是桌上仅摆着几个盐蛋和两碗蔬菜，当时我想到这样大文人，生活既如此清苦啊。

田老见我们到他家来了，连忙热情接待，我们首先提出带来田老写在条幅上的诗请盖上一个图章。田老一面盖章，自己又重复看了一下自己所写的诗句。我站在旁边问田老写给我的诗其中有一句

不懂解，田老当时耐心地解释给我听，他说：“艺事精时鬓已丝”。一个人的本事学好了，头发就白了”。黄元和向田老介绍我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湘剧三队工作，田老说：“群众中好育人嘛”。这是田老对我的鼓舞和教育。我们寒喧一阵之后，转入正题。黄元和向田老详谈了湘剧目前的现状。这就是演员阵容不齐、剧目贫乏、后继缺人，生活困难。政府（指反动政府）只在口头上说得漂亮，规定每年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其实并不真正扶植戏剧事业。接着他向田老举出一连串的事例：上演剧目要由警察局审批，备受刁难，四四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我们湘剧要求去参加，不支持我们要求组织“戏剧演员协会”，不批准；我们想自己办一个“戏剧子弟学校”，也不同意。田老听了汇报后，沉默了许久，他感叹地说：“我要象予倩（即欧阳予倩）在桂林那样就好办些，他是艺术馆长，我在湖南无职无权，现在不好解决，只能慢慢来”。说到这里，又鼓励我们说：“今后会有办法的”。“我这次到了上海，向朋友找些剧本寄来”。当时我们是不理解“今后会有办法的”这句话的含意。

我们知道田老回湘的接待很忙，不便多留，便向他告辞，田老亲自送我们到头门口，握手道别。

田汉同志此次回家乡长沙探亲，共约十天左右，曾到长沙东乡故居田家堰一趟。在一个风雨之夜，他偕夫人安娥，由长沙起程赴

上海，行前欣然有感，为湘剧写了五言 纪事长诗一首《湘剧忆事》（现已编入《田汉诗选》）赴沪路经南昌下车，曾到“百花洲”访友人郑亦秋不遇，无限怅然。到达上海后，由音乐家盛家伦同志伴送从天津唐官屯，过所谓“阴阳河”进入华北解放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倒是非常紧张多趣”。

附注：长沙解放后田汉同志只回过家乡两次（即1956年和1962年）。

怀念廖夔老师

政协委员 李子科

廖夔老师是湖南省曲艺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著名评书老艺人。他原名廖舜生，长沙市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幼时聪颖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长沙市妙高峰中学高中毕业后，父亲又为其延师设馆，攻读《左传》等古典文学。年轻时，爱好文艺，喜交朋友，同情穷苦人。因与湘剧艺人廖申肃、周圣溪等交往甚密，曾学过《父子会》、《下河东》、《单刀会》《水擒庞德》等湘剧，可算票友中之佼佼者。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湖南时，避难于蓝田（即今涟源）。为求精神寄托，曾拜当地

灵粹和尚为师，开始崇信佛教。并在友人引荐下，出任会友小学教师，以维持一家生计。后因同行挤兑，停教两年。抗战胜利回到长沙后，在长沙县继续从事教书生涯。

我认识廖夔老师，是在一九四七年初，那时我在长沙县英才小学读五年级。从这个时候起到高小毕业，他一直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很器重我这个学生，我也很尊敬这位心爱的师长。所以，他后来弃教说书，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关系。

记得他刚来学校的时候，学校大礼堂挂着每个老师的学历证书。廖老是长沙市砂高峰中学高中毕业生，当时对学历低的教师来说，也算是“正牌明星”。所以同学们都很尊敬他，校长也比较信任他。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国语、历史要求都能背诵。笔记要写得工整，错一个字要打一板手心。同学们都有点怕他。不过偶尔错一，两个字也不要紧，他会找点客观原因给你开脱，不致使你在大庭个众之中丢人显眼。所以尽管他的规矩订得吓人，实际执行惩罚的日子很少。

旧社会农村里的小学教师，在农民心目中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不论办什么事，只要是动笔墨，都会有人来登门求教。在众多的教师当中，由于学历各不相同，本领自有长短，对于那些单纯从“洋学堂”出来的教师来说，往往自愧无能；而廖老师新、旧学都读过，懂得的东西很多，很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农民家里婚丧、喜庆，写个什么对子，挽联，都少不得要到学校来找廖老师“借

翰墨”。廖老也乐于应酬，来者一律不拒。所以他到哪里，就能很快地和那里的群众结合在一起。

在那种人人自危，不谈国事的黑暗社会，廖老为人特别谨慎，他只管教书，从不过问政治。他很重视社会实际，看到农村贫困落后总是鼓励学生要好好读书。记得高小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请在校老师签名留念，廖老按每个学生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有个女同学叫刘淑智，给她的对联是：“淑自柔中得，智从书里求”。给我的对联是：“子者乃古时美男子之美称，科学为今日诸学科之首务”。他对学生的这些勉励，自比那些“大智若愚”、“家族之光”之类的过奖之词要实际得多。

廖老博得的知识很多，但他最爱好的还是文艺。他很熟悉历史，他上历史课几乎就是故事课。在我短短的两年学习中，列国、三国，东西汉，乃至明清故事，他都说到了。他喜交朋友，同情穷苦人。因与湘剧艺人廖申翥、周圣溪等交往甚密，曾学过《父子会》、《下河东》、《单刀会》、《水擒庞德》等湘戏，《水擒庞德》的关羽，《扫松下书》的张广才，《金沙滩》的卢俊义都唱得很出色。可算票友中之佼佼者。记得有一年学校附近唱皮影戏，戏班子听说有这样一位老师会唱湘剧，特地请他串了一出《金沙滩》，由于廖老学的是表演湘剧，用的是丹田气，嗓音圆满，喷口有力，自比一般唱皮影的“漱口子”要强得多，所以观众都鼓掌叫好。

他不但能唱，而且能编。解放初期，为配合农村清匪反霸和土改

运动，廖志曾编过两出地主欺压农民，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典小戏。苦于当时找不到发表园地，至今我还记得一些唱段。后来因患结核病，身体欠佳，遂弃教从艺。开始入湘舞花鼓剧团任编剧，笔名文曼，并改编过《从八百里洞庭》等大型剧目。由于剧团到处奔波，生活艰苦，一九五五年便离团说书，开始经验不足，上座不佳；后来技艺日精，书场日渐兴旺。一九五九年曾以他为首组织过有姜一慎、谭运生、谭培炎、周显恒参加的五老曲艺社，在火宫殿开展说书活动。他的常说书目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岳飞传》、《清官十帝》以及《说唐》、《西游》、《封神演义》等。其中尤以《三国》见长，故长沙听众中有“廖三国”之美誉，他说书声音洪亮，喷口有力，表演入神。说到精采处，能恰当地运用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把书说得引人入胜，这是一般说书艺人所不及的。由于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说书艺术上有他自己的创造，如诸侯割据的东周列国，这部书比较散，历来看的人多，能说的人少，但通过他的巧妙剪裁，说得天衣无缝，首尾连贯，他不但长于讲史，而且积极倡导说新书。一九六三年曾以他为首在长沙市西区文化馆成立湘江曲艺队，正式收徒授艺，带头演讲《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羊城暗哨》、《战斗在敌人心脏》等书。文革十年，书场冷落，生活极为清苦。晚年住在著名弹词表演艺术家舒三和住过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一床破棉絮，一张破竹椅，一盏小煤油灯，算是他的全部家当。有时为饥寒所迫，就

到农村旧时学生家中，邀集农民数人说书，凑点茶资过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解冻，书场复苏，他极为高兴重返书场说书。省四次文代会后，长沙市组织了一次民间艺人交流演出，他说了一段《完璧归赵》，年近古稀的廖老，声调还是那样激越，嗓音还是那样宏亮。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给下一辈艺人留点东西。一九七九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南分会鼓励他整理老艺人潘子和的遗稿《三湘英雄传》，他高兴极了，当时我们都表示积极支持，我说：“你那写作条件不太好，我想办法在我们单位给你找间客房，我这里有的是稿纸。可是他不愿麻烦别人，过了一段时间这部六万字的中篇评书（纲书），就在他那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内，用不太大的日记本记录出来了。后来这部书经过周汉平同志的再整理，改名《太平隐义》，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开始在《文艺生活》期刊上正式发表。

廖老说书，注意创造，更忠于历史。他认为改，也要有个范畴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他看到书场上杜撰的东西太多，心里很不安，他说：“反映历史的电影都不能混乱历史真象，那么，历史小说就能混乱历史吗？！”虽然他的看法不一定全对，但他对说书艺术，始终是那样严肃认真，基本上做到艺术与历史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十多年来，不论潮起潮落，廖老始终热爱他所从事的说书艺术。遗憾的是近年来书场上剑侠小说盛行，而史书逐渐冷落。但廖老并不气馁。他认为随着国家四化建设的向前发展，随着群众文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除了娱乐，人们总还希望获得知识。冷落只是暂时现象，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对听众负责。不能只顾赚钱，不顾社会效果。城市没有书场，他就到乡下去，到他曾经教过学的农村去。那里的农民确实很欢迎他。他的住房条件不太好，1980年冬天就是在乡下一位农民家里渡过的。1981年上半年，有两个农民来我家作客，他们一个是廖老的学生，一个是他学生的家长。那天碰巧廖老也在我家。虽然阔别三十年了，见面非常亲热。“廖老，到我们乡里去吧！每个学生屋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吃饭不成问题。现在农村经济搞活了，不会要你老人家掏粮票的。”他们就这样风趣地攀谈着。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农村是他的主要书场。这也说明农民极需听好书。

廖老是1981年8月20日患脑溢血，由乡下两个农民护送到长沙市医院的。入院前三天，我还收到了他八月十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谈到说书，他无限感慨地说：一个人老了，人皆有一种看法，认为宜早作‘安息’准备。我自认身体尚无‘安息’兆，怎能枯守等死呢？“我现在乡，常于月白风清之夜，苕堤绿茵之中，与乡人聚谈历史小说，稍有一点收入。然日里闲得发慌，既无报刊可观，又无文章可写；大好时光，等于白活，岂老年人之规律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事隔几天，他老人家就在九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了，终年68岁。

（本文修改后未经作者审阅）

民族资本家朱禹田

文史委员 朱运鸿

朱禹田，号昌龄，长沙人。生于前清道光二年，卒于民国五年（1822—1916），享年九十四岁，是湖南早期一位民族资本家。他祖籍安徽，于康熙年间迁来长沙，历经数代，均以小农经济为业，传至禹田，习孔孟之学，道光二十九年，朱禹田二十七岁时，应县试名落孙山。翌年经友人介绍，在藩府坪，云南藩台唐荫云家坐馆，一年学俸三十二吊铸钱。唐荫云家，广有良田，这年收割季节，阴雨连绵，佃户多用芽谷送租，谷价极低，每担仅值五百文，还无人问津。朱禹田想收购囤积芽谷与他当时在草潮门开小碓房的父亲商量，因缺乏资金，遭到父亲反对。第二天，朱禹田回到唐荫云家，愁眉不展，被唐荫云看见，问其原因，朱禹田以实相告，唐荫云笑道：“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后再兑价可以。”朱禹田见东家愿意出让芽谷，遂将所有芽谷数千担一并囤积。谁知第二年天旱无雨，芽谷卖到二千七百文一担，朱禹田大获其利，以一千文一担还唐家帐。唐荫云为人正直，不肯多收，仍然以原议价五百一担收价。唐荫云见朱禹田善于理财，便要他司会计。不久，朱禹田辞去唐家职务，转入商界，做黑茶生意，由安乡县收购茶叶运到陕西泾阳县，设立茶庄。泾阳县有条河流，水质很好，朱禹田取其